

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

□ 阎 纯 德

—

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话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是的，中国文化从未断流，它一直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去，带着中国文化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成为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于是就有了“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①汉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门专学。

汉学从萌芽到发展和成熟，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它的真正建立，应当归功于大批入

阎纯德：《汉学研究·序》，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6 年版。

华的耶稣会士。从那时开始，西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于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介绍和研究对象的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俄国等国家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文明依仗科技、工业、商业之优势，以不文明的方式压制东方文明，致使东西方之间长期处于不和状态，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写满了宗教怀柔和炮火相加，“交流”伴随着掠夺，但是这个不平等的“交流”却衍生了一对文化双生儿：“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这一双不平等的文化孪生儿的成长过程创造出了汉学。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西方知识者认识、研究、理解、接受中国文明的历史。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汉学的发生和兴盛发达。西学东渐的同时，也为中学西传开通了道路，架起了桥梁，为汉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欧洲为先驱，汉学是在西方一代代汉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传统的。

汉学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续。但是，它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就是说，汉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具有镜子的作用、借鉴的意义。

二

现在谈论什么是汉学的问题似乎可笑。事实上，何为汉学，是需要明确或澄清的。时至今日，国内几家汉学研究所及其出版的书刊，所指的都不是汉代以降文人在经学研究方面以重名物、训诂、考据为主的那种“汉学”，皆系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学问。前者延续至今的，很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这可以从北京出版的《国学研究》和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得到证实。现在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汉学”从原来的

（国内汉学）认识上剥离下来，这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规范化。李学勤教授在《国际汉学漫步》序言里说：“‘汉学’，英语是 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 SINOLOGY 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较为方便。”还说“‘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就像 SINOLOGY 的词根 SINO 来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我很赞同这个看法。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和中国多数学者构成的共识，或者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约定俗成。但是为了同“国内汉学”区别，学术界还是有了“国际汉学”、“海外汉学”或“世界汉学”的说法。以我的看法，最好是把“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统称为“汉学”；“国内汉学”称为“国学”。当然，大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叫法，各行其是也未尝不可。关于“汉学”和“中国学”，“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从传统上讲是有区别的，前者更传统，更富有欧洲之人文精神，偏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而后者则多一些现代性，多一些包容性，更偏重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考察。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管是“汉学”或是“中国学”，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致的，其研究和考察对象是一个从古至今的整体中国及其历史文化。

三

什么是汉学研究？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近于空白。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清朝末年，王国维算是较早对汉学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国学者，在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并翻译了他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后，认为伯希和的看法“优于中学”。但是，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戊戌变法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汉学，但毕竟还是寥寥，系统的汉学研究更是少见。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里，中国的先觉者，所关心的是中国的生存或自救，看重的是西方的科学和坚船利炮，而对自己文化里派生出来的汉学无暇给予太多的关心。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驱们，看重的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批判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移植和吸纳，对汉学研究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说到汉学研究，倒是日本人先走了一步。比较早的，有日本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年出版）和《欧美的中国研究》（1942年出版），以及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起源》（1933年出版）。直到1949年，中国学者莫东寅才出版了汉学研究专著《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这部汉学研究著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其意义深远，因为我们毕竟有了第一部汉学研究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0年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几乎不谈汉学。而学界自发地较多地关心汉学和开始研究汉学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给汉学研究带来的契机。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汉学已被学界普遍关注，而且专学、显学的色彩越来越浓，在它的大门前熙来攘往地已经聚集了一群仁人志士。

按照李学勤教授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的汉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汉学情况的调查了解和汉学作品的译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就是代表。第二阶段是90年代，其标志

是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汉学专门刊物的出现。自 1991 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之后，在北京相继出现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及中华书局的汉学编辑室等，先后出版了《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等书刊。第三个阶段，是当下正在进行和正在发生的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成熟。“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又要有综合研究。”^①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源”，显而易见，汉学就是“流”。当然，这个“流”也是相当浩瀚的。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还非常少，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汉学著作也还没有译成中文。就是说，等待我们去的工作还很多。另外，虽说汉学这块他山之石里蕴藏着不少真知灼见，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误解、误读也随处可见，这也需要我们认真读书、思考、比较、梳理和研究。《列国汉学史》和《世界汉学史》还没有问世，从中外文化比较学等角度对汉学进行深刻理论研究的著作也还没有。这就是当下我们分散而不整齐、奇缺经费的汉学研究界所面临和正在从事的艰巨任务。

四

汉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点点滴滴、不知不觉的酝酿过程，它是漫长历史的智慧浸润出的花朵。

西方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与目的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却共同滋润了汉学的发生和发展。汉学从盲目到自觉，从猎奇或政治到学术，是西方深入认识中国和东西方“磨合”的一个历史

李学勤：《汉学研究·序》，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 年版。

过程。在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上，汉学的现代性表现为弱肉强食般的掠夺，近代史上汉学的成功积累是以中国的屈辱和痛苦为代价的。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有案可查或无案可考的中国文化典籍的惨痛被盗和“流失”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它们至今还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异国的文化场所或不见天日地躺在私人家中的阴暗角落；到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之后，由于世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汉学”成为政治的一个部分。本来汉学应该是从纯学术的襁褓中诞生的，但是学术却遭到了政治的强暴。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政治意识相对淡化，就汉学而言，随之而来的是学术意识的逐渐增强。

人类至今并没有摆脱战争的威胁。真正的文明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是 21 世纪，将给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机遇。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高速公路，不会把我们引到文化全球化的胡同里。文化交流，文化互补，始终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程序。这个程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是说，高科技虽然影响文化的发展，但它不会使之变为一体化。所以，中国文化将会永久地存在下去，汉学和汉学研究也将永远存在和永远进行下去。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各国学者在人类新的历史时期，倍加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借助信息网络，“中学”外传便得以加大加快，所以各国还会产生更多的汉学家，汉学不但不会停滞，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汉学研究也会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时代特征。由于人类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全球化”联网，于是文化人便创造了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梦想。人们不断强调文化认同，强调“我们是谁”，而不是“我是谁”的问题。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 90 年代世界冷战后，爆发了认同危机，

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事实上，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然后才属于世界。亨廷顿认为意识形态的对抗行将转化为文化认同差异的对抗。似乎我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也是与汉学和汉学研究有关联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绿色通道，自然它会给文化带来巨大影响。但是人类文化只能认同一种文化吗？文化能够“全球化”吗？“全球化”是一元化吗？若是一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我深信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虽然在网络上国家失去了国界，城市拆除了城墙，但是多数民族的文化都不会因此失掉传统，尤其像中国，中国文化的“中华性”之根基是不会动摇的。现在我们所预测的未来，是在没有硝烟的蓝天下进行的浪漫操作，事实上战争是可以粉碎任何美丽理想的。但是，不管世界怎样发生变故，中国文化不会消亡，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究不会消亡。当然，如果人类能在 21 世纪长期和平相处，东西文化就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彼此接近彼此认识，甚至可以互补，兼容优长。

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东西文化毕竟互相接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比如交通、印刷出版、电信、信息网络等，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为汉学的发展和汉学研究的进行带来了便捷和好处。中国文化不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没落和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变则生，不变则亡。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逐步自我完善，然后才能进步。

汉学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借鉴。汉学研究是对外

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 21 世纪的新汉学，会包蕴更多的当代意识特征，而有别于 20 世纪以前的旧汉学。 21 世纪的汉学研究，也一定会有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 之管见

□ 方 骏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学术界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突破了重重天然和人为障碍，终开起步车，形成了一种小气候，科研成果新累枝头，科研队伍初具规模。在出版界的书山报海中，也能偶拾几枚海外汉学作品之珠玑。无论是从思想观念的解放与转变、学风的端正、视野的开阔，还是从科研体制的改革与正规化上来看，都是令人欣慰的，出现了可喜可贺的局面。这应归功于那些既精通外语又有中国文化之功底的学者，这是他们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结果。如果这种势头能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中国科研与国际学术界的全面接轨，便指日可待了。

科研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与国际学术界全面交流，特别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资料共享，信息互通，成果共用。科学无国界，科研无禁区，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财富，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本属

于学术界的常规行为，在我国却跋涉过一条坎坷不平的漫漫长途，越过了无数障碍，才终被拨乱反正，步入正轨。数代学人筚路蓝缕，奔走疾呼，全身投入，才出现了这种来之不易的形势。吾辈晚学矣，在晚年也总算赶上了这种科学的春天。

何谓“汉学”，中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其实，《辞海》中为它下的定义，至今仍不失其公正：“外国人称中国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称为‘汉学家’，今译‘中国学’。”我以为“汉学”主要是指对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学”则是指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和地区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汉学、藏学、突厥学、蒙古学、满学等；“中国研究”则更加侧重于中国当代和现实问题。当然，这些领域都是互相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准确地截然区分。我们不妨用“汉学”统称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不凡，但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一些混乱，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

首先，我们承认，海外汉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资本主义商品大生产掠夺海外市场、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有着因果关系。当然，它与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和中国的世界地位也密切相关。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继16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之后，在西方殖民列强中兴起的三大东方学（中国学、亚述学、印度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殖民政策服务。西方汉学自16世纪初以来，其发展过程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基本上是同步的。18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经历了第二次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殖民列强大举向东方扩张而造成的。19世纪中叶，西方汉学经历了第三次发展，殖民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从他们在中国强行大量销售鸦片而发的不义之财、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支付的巨额赔款中，拔下九牛一毛，来从事

多方位的中国研究（办学校、教堂、医院、科研机构、出版报纸书刊、挑选留学生）。西方汉学的第四次发展则以 20 世纪初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为契机。西方整个 20 世纪的汉学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庚子赔款”。其中美国最具代表性。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汉学研究所，也是直接利用“庚款”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西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环境与经济繁荣，同时也是出于东西方冷战和遏制中国的需要，汉学研究出现了第五次发展。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学研究成了西方与中国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的这第六次发展，这次的情况与前几次不可同日而语。政治斗争依旧存在，但已为汉学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联系中外学者友谊的纽带奠定了基础。

西方汉学一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起来之后，其结果就会突破其始作俑者的初衷。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在中国那魅力无穷的历史文化吸引下，多数汉学家都具有“学术正义感”。他们酷爱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化圈（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圈，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圈，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化圈）之一的中国文化，仰慕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怀着真挚的友好感情。他们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研究中国的事业（实际上，“汉学”在西方从未成为一门名利双收的“富贵职业”）。他们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观点也客观公允。这一点在西方汉学界的考据派学者们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参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以他山之石攻玉的道理。惟有汉学家才是海外从深层次上真正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有识之士，他们是中国国学界的真正同行与知音。中国学术界要想赶超国际学术水平，与他们交流必然会大有裨益。

对于我国海外汉学研究的现状，国内学者们的评价见仁见智，诸说纷纭，甚至相去甚远，大相径庭。在译介和研究外国汉学作品的数量问题上，有的人惊呼太多了，有的人则深感不足。其实，现实是明摆着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三四百年的汉学研究史。每个国家的汉学队伍从几十人到数千人不等。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汉学学术著作与论文不计其数。据全欧汉学研究会 1994 年统计，仅在欧洲国家，在 1985—1994 年间，便有 5000 多人注册攻读有关中国的博士学位。我们国内翻译发表外国汉学家的学术论文，每年最多也不过百余篇，学术著作也在二三十种左右（纯文学、旅游、知识性、评介性、时事政论著作和画报图册不计在内）。所以，国内对外国优秀汉学著作的译介，在数量上远远不足。在译介著作的选择问题上，往往也背离了学术界的需要。译者根据翻译难易程度而决定取舍，出版机构及报刊又出于经济杠杆的驱动，往往都选择那些通俗易编译、印数较大和出版后有经济效益的汉学著作翻译出版。对于那些倾注了外国汉学家们毕生心血、代表着世界一流学术水准的高精尖汉学著作，译者不愿意费力不讨好；出版机构也考虑到，在付出巨大人力物力之后，会造成巨额亏损，故敬而远之。这样一来，许多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写出的通俗读物，却要从外国翻译引进；真正使中国学术界受益匪浅的一流的外国汉学作品，却藏在深山人未知。其实，翻译出版外国汉学著作的惟一取舍标准应是其学术水准，译介的外国汉学作品必须是第一流的学术精品与传世佳作，否则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从国内译介和评论外国汉学成果的科研队伍来看，也远不成比例。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就是重论著轻翻译。译介和评论海外汉学作品，要求译者具有双重学识，既要精通外语和汉学家所在国的文化，又要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一名中国学者或外国汉学家，可以终生钻研一个具体问题或领域，最

后以一本书发表其全部成果。中国译者不可能将其专业领地划定得如此狭小。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又将外语教学与中国历史文化专业武断分开。在出国“下洋”风和经商“下海”风劲吹的年代，外文水平高的人难以在学术界长期扎根，安于清贫、甘于奉献。所以，这一学科的人才比其他任何一个学科都更加匮乏。且他们在评职称、享受国家科研基金方面，又远不能与其他科研人员在平等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样一来，在海外汉学领域中，便出现了呼吁者多，行动者少；空泛议论者多，深知内情者少；观阵者多，投身者少；鼓动者多，实干者少的虚假热闹局面。

在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问题上，不必说在相差甚远的中文与西文之间了，就连英、法、德、意、西、葡、荷诸语言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翻译的大量重要学术著作。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功勋卓著。不论一个人有多大学问，他都不得不去阅读大量的翻译作品。

我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外语能完全过关的学者，犹如凤毛麟角。由于国外图书昂贵，故国内只重点进口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图书，高度专业化的社科类图书进口很少也很不及时，难觅芳踪。中国学术界与外国同行间又严重隔绝，交流格外艰难。所以，翻译出版国外汉学著作，就是我国学术界打开门户，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文化和科研是否也有个全球一体化的问题。每项科研成果，都应使全世界了解和利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外国同行中早就有人提出了能够成立的答案，而有些中国学者仍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辞辛苦地埋头攻关。多年之后，他们又自以为是“最新成果”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而招致外国同行们的撇嘴和白眼。当今是信息的社会。封闭性的书斋研究，十三经注疏式的考证，已经远远落伍。只有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依靠自己，借鉴他人，才会使中国的科研攀登世界巅峰。

个别中国学者认为，中外文化交流完全可以绕过国外汉学家，直接与所在国主流文化派学者打交道。此说貌似有理，实则难以行得通。对于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不长期下苦工夫攻读钻研，根本无法掌握其要领与精华。几次学术讨论会、几次侃侃而谈，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术交流。惟有汉学家们才具备从深层次上与中国学术界打交道的资格。为了准确、全面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舍汉学家又能其谁？

还有人说：“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缺乏理解，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与沟通。”有的学者还认为这种交流无异于“聋子的对话”。此说虽非空穴来风，却又偏颇极大。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来辩证同一命题。在责备西方学者不谙熟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真实内涵究竟又知几多？不必特意苛求，如果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精通程度，达到了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水平，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流、借鉴，甚至是交锋，就容易得多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文化价值的差异，那些学有所成和成绩斐然的西方汉学家，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立场、方法以及世界观，与我们都有距离和差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和向世界介绍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其精神可嘉，其成果令人刮目。因为他们既不会像商贾大亨们那样重利轻义，也不会像政坛权贵们那样玩“政治牌”。他们是献身学术与友谊的民间文化使者。

对于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究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也各执其说。为了研究海外汉学，首先必须准确而全面地了解海外汉学。有靶心，有对象，有资料，才能促产研究成果。我们绝不能根据作为“文革”遗风的那种断章取义的文摘来片面理解海外汉学。翻译介绍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工作。每种译作至少要印行数千册，足可飨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译介和研究之才能和角色，很难由同一个人兼备和同时扮演。译介是个别人的

事，利用、参考和研究则是学术界众人的事。责备译者不去从事研究，实在有失公平，就如同译者不能苛求研究人员亲自从事翻译一样不现实。科学总会有分工，各司其职，既要人尽其能，又要密切结合，这才是上策。

海外汉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而是一个综合或交叉学科，它是各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文、史、哲、经领域，还是其他新兴学科中，学者们都应掌握国外汉学界相应同行的最新动向与成果。让一个人同时掌握诸多学科的动向，也是行不通的。海外汉学研究的目的是供中国学术界利用。中国科研人员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海外汉学中最急迫介绍的内容。

每提到国际汉学，有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只讲英、美、日，而忘记了这个学科中的先驱。

西方汉学最早是在南欧的几个航海大国和老牌殖民国家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应运而生的。但法国很快就执西方汉学研究之牛耳。在美、日两强自 20 世纪初崛起之前，法国在汉学研究中始终独领风骚。18 世纪之后，巴黎被誉为“西方汉学之都”。西方有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以法国为首的拉丁语世界的汉学，与以英、美为首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明显不同。日本的汉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的影响和启发下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早期的汉学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国汉学的影响，甚至有不少美国汉学家本身就是由法国培养出来的。

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汉学，于 19 世纪之前，基本上是由三大领域组成的：纪实性著作（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译著中国经典和著作（四书、五经、史地、文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和宏观性地介绍中国的著作，尚且谈不到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

西方真正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应该是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于 1814 年 12 月 11 日在法兰西学院创始“汉语和

鞞鞞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实际上是于 1815 年 1 月 16 日开课）开始，1920 年，法国汉学研究所在当时的法国总统和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赞助下创建。西方列强随后便逐渐群起而仿效。英国于 1876 年，荷兰于 1875 年，俄国于 1851 年，德国于 1912 年，先后使汉学研究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研究海外汉学，对于这段历史，应该略知一二。

多年来，笔者本人始终从事海外汉学的研究与译介。以上仅是个人经验之谈，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汉学与人类间的文化交流

□ 程裕祯

文化交流是人类相互接近、相互理解，从而达到和平共处的一条有效途径，是人类发展史上永远绚丽灿烂的画卷。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曾经谱写了无数震烁古今的壮美乐章，以至使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耳熟能详，并且在论及往事时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但是，仍然有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件有待我们去挖掘和整理；有许多知古鉴今的经验有待我们去归纳和总结；有许多前赴后继的人物有待我们去认识和理解。人类的不幸，就在于因地域或语言文字造成的相互隔膜，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理解；人类的悲剧，更在于运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壁垒互相隔绝开来，甚至用一种狭隘和粗暴的心态来对待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为了开辟人类交流的路径，为了打破各种阻碍交流的壁垒，我们的前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不畏艰险，万死不辞，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铸造了一座又一